

越界的歷史、越界的認同

：八重山台灣人與大阪濟州人比較研究*

朱惠足**

< 차례 >

- I. 沖繩八重山群島的台灣移民
- II. 大阪豬飼野的濟州島移民
- III. 超越東亞國族主義的跨界思考

중문요약

本文將八重山台灣移民與大阪豬飼野濟州島移民的移動經驗與民族認同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國家與民族交界處的島嶼居民之「越界」經驗與思想，能以何種方式介入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具有強烈「領土」意識形態的「陸地式」國族主義思想。

從東亞國家政治版圖與角力關係來看，台灣、八重山、濟州島、大阪之間的兩個流動與移居的歷史，都是發生於國家或帝國「大歷史」的邊陲。然而，他們與國家中心的相對性邊陲，同時也意味著他們與國族界線的鄰近，促使他們能夠在不同質的僵硬政治區塊之夾縫當中，掙扎著穿鑿個人的生路。他們的跨界流動經驗，超越了現代國族思想中民族、國家、語言、

*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濟州大學耽羅文化研究所國際會議「從他者的角度看濟州島」(2010年 9月 17日、18日)，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以及討論人朴贊植先生、會後兩位匿名審查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跨國流動與文化再現：以台灣、亞洲與全球化為思考架構－總計畫」(NSC98-2420-H-005-002)部分研究成果。

** 台灣·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文化之間單一的對應關係，生產出有異於現實政治意識形態與運作邏輯的概念與思考。「越界者」看起來似乎不受「界線」的束縛，但其實沒有人比他們更意識到「界線」的存在以及影響。在不將他／她們的人生經歷浪漫化的狀況下，我們應該透過國界之島的人們之移動軌跡，以及從中產生的「界線」感覺，試圖使近現代國族主義下僵化的「國家」與「文化」的界線，能夠因應人們實際上的生活經驗與存在狀態，創造出更具流動性與柔軟性的概念與思考。

Key Words：八重山台灣人、大阪濟州人、移民、越界

自從十九世紀下半西方勢力進入東亞之後，東亞的秩序與歷史發展便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揭開序幕前後十五年之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分別壓倒中國與朝鮮，將台灣(1895)與朝鮮(1910)吞併為殖民地，建立唯一的亞洲黃種人帝國。此後便在資本主義與軍事入侵的結合下，逐漸擴張版圖至南洋與東南亞，邁向軍國主義與戰爭之路，直到1945年無條件投降為止。然而，到了「戰後」，飽受戰爭蹂躪的東亞並沒有獲得和平，反而接二連三地爆發中國國共內戰與韓戰，之後在美國勢力的介入下進入民族分斷的「冷戰」時期。

作為中國、韓國與日本三個東亞國家之間的島嶼(群)，台灣、濟州島與沖繩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捲入東亞波濤洶湧的歷史變動中，經歷了離鄉背井、強制勞動、離散與戰亂的苦痛。島嶼四周為海洋所環繞，島嶼出身者面臨耕地不足的生存困境時，只能夠遠渡重洋向外尋求新的天地。從戰前到戰後，中國、韓國與日本的國界多次重新劃分，島嶼出身者的生活也隨著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情境變化，而受到深刻影響與制約。然而，越界的實踐與歷史同時也促使他們超越民族國家的既有制度

與思維，生產出具有流動性與多義性的思想。筆者曾在沖繩縣離島的八重山群島進行數年的田野調查，訪談戰前到台灣工作的八重山人，以及從戰前移居八重山的第一代台灣人¹⁾，藉此思考兩地之間人與物資的移動，生產出何種現代性經驗與知識結構。²⁾ 本文則將八重山台灣移民與大阪豬飼野濟州島移民的移動經驗與民族認同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國家與民族交界處的島嶼居民之「越界」經驗與思想，能以何種方式介入中國大陸、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具有強烈「領土」意識形態的「陸地式」國族主義思想。

I. 沖繩八重山群島的台灣移民

八重山群島位於沖繩本島與台灣之間，其中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離台灣蘇澳僅111公里，行政中心的石垣島距離台灣也才277公里，比

1) 受訪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出生、長大，青年期以前與父母、兄弟一同移居石垣島，也可稱為第一點五代。不過因為他們出生長大於台灣，也自認為是第一代，因此本文稱他們為第一代台灣移民。

2) 朱惠足，〈做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文化研究》5，2007年，49-86頁。日文版刊於：早稻田大學沖繩研究所《琉球・沖繩研究》第3号，2010年。八重山諸島與台灣鄰近，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原本作為日本南方門戶的八重山之現代開發隨之停頓。不過，到台灣都市工作的八重山人接受了日本現代文明的洗禮，同時，榻榻米等日本的現代物資也經由台灣大量進入鄰近的八重山諸島。同時，八重山人原先對殖民地台灣具有刻板印象(被稱為「生蕃」的原住民)，到台灣後卻發現自己的文化與「生蕃」相近，而且台灣另外還有具有中國文明的漢人，因而產生自我認同的錯亂。另一方面，台灣人在八重山因為民族差異、被殖民者歧視與生存競爭，被刻印為「前現代」民族而受到排斥。另一方面，台灣人亦將台灣的農業文化、拜土地公等移植到八重山，將祖先從閩南(福建南部)移植到台灣的文化進行再移植。筆者透過兩地的地緣政治學位置轉變、民族接觸及文化再移植，討論雙向移動日常生活實踐、帝國論述及主體意識的相互作用當中，「現代性」的相關知識結構如何被建構。

到沖繩縣政經中心的那霸(411公里)還近，更不用說到日本首都東京(1,952公里)。從大阪經由沖繩抵達台灣基隆的大阪商船「內台航線」，更是促成了台灣人移居八重山與沖繩本島的重要契機。八重山每日新聞記者松田良孝在《八重山の台灣人》一書中，根據《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八十年史》(大阪商船三井船舶株式會社編，1966年)介紹大阪商船「內台航線」之歷史變遷。早在日本統治台灣隔年的1896年，台灣總督府便提供補助金，命令大阪商船開設定期航線的大阪—台灣線，隔年四月並開設經由沖繩抵達台灣等五個航線。隨然台灣的開發，從日本運送建材、雜貨到台灣，從台灣運送砂糖、鹽、米與水果到日本的貨運頻繁，日本郵船、山下汽船、辰馬汽船、川崎汽船等海運業者也都加入競爭。³⁾

根據西表信的《南島昭和誌》，最早從台灣移居八重山的為台北樹林出身的劉福(1981年歿)，於昭和4年(1929年)到八重山行政中心的石垣島販賣台灣的日常雜貨。同時期也開始有台灣人至西表島礦坑從事礦工工作⁴⁾，後來則有農民集體前往開拓。根據30年代初期八重山當地報紙的報導，當時西表島有50名、石垣島有100名左右的台灣移民開墾田地種植稻米。⁵⁾ 1937年，幾個台灣人資產家受到台灣總督府經濟控管政策打擊，轉移到石垣島成立「大同拓殖株式會社」⁶⁾，從台灣中部招募

3) 松田良孝、『八重山の台灣人』、南山舎、2004年、28頁。

4) 請參照三木健對西表島礦坑台灣人礦工進行的歷史調查。1943年前後因為戰事吃緊，礦工紛紛被徵調從軍，加上運送煤炭的船隻無法航行，礦坑一一關閉。部分台灣人礦工及家屬沒有回台灣，移居石垣島務農。三木健、『西表炭坑夫物語』、ひるぎ社、1990年。

5) 嵩田公民館記念誌編集委員會、『嵩田—50年のあゆみ—』、1996年、14頁。

6) 1932年，日本在台灣實施經濟控管政策，將75個鳳梨罐頭公司強制統合為一社。1935年，事業遭受打擊的企業家林發、謝元德、詹益侯轉移到石垣島成立「大同拓殖株式會社」，開始進行鳳梨、香蕉等副熱帶植物的栽培、黑糖製造、製茶等。

330名農民到石垣島栽種鳳梨。另外，約600名左右的個人移民租借大日本製糖會社的土地，種植稻米、製造甘藷粉。集體與個人移民的台灣農民在距離石垣市街10公1945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結束，八重山與台灣之間出現國際法上的界線。然而，兩地之間人與物資的交流並沒有因而終止，趁著戰後的混亂以走私偷渡的方式持續進行，直到50年代初期，國民黨與美軍外，約琉球政府開始嚴格取締為止。⁷⁾戰爭期間回台灣避難的人大部分沒有再回到八重山，有些人則因為戰後的生活困境再度回到名藏、嵩田。灣的首先面對的卻是被迫歸還戰前所租借的土地，一切從頭開始。根據1965年日本的臨時國勢調查，八重山地區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國人有230人，占沖繩縣內的24.5%。⁸⁾逐漸有經濟基礎台灣移民開始搬到石垣島市街居住，在石垣島的公共市場一帶經營雜貨與蔬果生意。到了60年代，一批台灣新移民進入八重山，主要為工廠作業員、餐廳廚師等當地欠缺的技術人員。新舊雙方的台灣移民雖然想取得日本國籍，但無法取得中華民國的國籍放棄證明，在沖繩即將復歸日本的1970年前灣的擔憂政權轉變後土地、財產再次受到剝奪，首先爭取取得永久居留權。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尚統治結的中華民國成尚執政權」代表長久以來不願提供國籍放棄證明的中華民國政府，擔心海外華僑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才開始協助包含八重山台灣人的華僑進行歸化。⁹⁾戰前到戰後初期的農業移民，加上60年代以後的新移民，目前八重山的台灣人及其子孫約有600多人，集中居住於石垣島。¹⁰⁾

7) 石原昌家、『空白の沖繩社會史—戰果と密貿易の時代』、晚聲社、2000年。

8) 同註3，頁102-103。

9) 同註3，頁147-168。

10) 以上八重山的台灣人歷史概況，參照朱惠足，〈做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

八重山的台灣人在戰爭期間至戰後初期的數年之間，經歷了非常劇烈的變動。筆者訪談的台灣人移民對於1937年爆發的中日戰爭沒有太大關心，直到1940年代戰事激化，1943年開始日本軍部命令八重山的老弱婦孺疏散到台灣避難，八重山海域也因美英機動部隊的空襲而受到海上封鎖之後，才感覺戰爭逼近身邊，幾乎所有台灣人都返回台灣避難。¹¹⁾因為台灣人搭乘的不是疏散船而是走私船，在美英的海域空襲下相當危險。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台灣從日本的五十年殖民統治解放，回歸祖國中國的領土。

從戰爭激化到戰爭結束，台灣與八重山之間的海洋原本是連結兩地的「媒介」卻成爲難以跨越的「分界」。在日本與美英的戰爭下，海洋化爲戰場的一部分，阻礙了台灣人的歸鄉之路。戰爭結束之後，台灣與八重山之間的海上，更出現一道看不見的界線——國界。新的界線產生的同時，以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爲中心，兩地之間走私與偷渡活動也頻繁地進行著。戰後再度回到八重山家園的台灣人，也是利用走私偷渡的方式，冒著危險非法跨越國界線。安全回到八重山的台灣人擔心「若回台灣就無法再出來了」，直到60、70年代歸化爲日本籍以前，即使有至親長輩過世，也都無法回台灣。

「海洋」成爲「國界」的重大歷史變動，對於八重山的台灣人有何意義？訪談過程中台灣人耆老敘述的以下兩個故事，或許可提供相關思考。第一個故事是，2002年接受訪問時已90歲高齡的台灣人老先生，談到父親在疏散途中九死一生的經歷：

於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52頁。

11) 戰爭期間「大同拓殖株式會社」的工廠成爲日軍駐屯地，沒有疏散的三、四個台灣人家將種植的番薯與日軍換成現金維持生活。

昭和20年的2、3月左右，我帶著妻子先行疏散到台灣。父親則在戰爭快結束時才搭走私船準備疏散到台灣，然而卻在途中遭受到美英飛機的攻擊。一艘走私船被擊沉，父親搭乘的船以及另一艘船則漂流到無人島上。父親等人在無人島等待救援時，戰爭結束了。父親等人直到獲救後，才知道日本投降、戰爭結束的消息。聽父親說，飛機空投救援物資的餅，有一個小孩在饑餓數日後吃得太急、太多，竟然就這樣撐死了。

雖然戰後沒多久父親就生病去世了，身為兒子，他非常慶幸父親沒有在海上或無人島上喪生，因為「那就無法好好將他埋葬了」。尤其是，相對於被擊沉的船上的人或是被救援物資「撐死」的小孩，父親能安然歸來「真是佛祖保佑」。

在老先生的父親漂流、等待救助的無人島上，國家、戰爭、歷史與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就只有「生」與「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八重山台灣移民在無人島上等待救援的經歷，既是超越歷史的(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同時也是個人命運受到歷史無情操弄的片段之一。

第二個故事則是75歲的台灣人老太太回顧戰後從台灣再度回到八重山時，到廟裡求籤的過程：

戰後，我們決定從台灣回到八重山，那時剛好丈夫親戚住的地方的廟正在舉辦盛大的做醮儀式，丈夫說我們先去看歌仔戲¹²⁾，然後再出發，於是兩人便到廟裡。看戲之前，丈夫在廟裡抽了一支籤占卜這次到八重山的吉凶。結果，抽到的籤意思是說，如果要的話就要馬上出發，朝著東邊的方向前進不要猶豫。抽到這樣的籤之後，我們連歌仔戲也沒看就馬上趕回家裡，收拾好簡單的行李就到港口去。到了港口，剛好船隻要

12) 台灣的傳統戲曲，源自於中國閩南地區，廟會祭典時在廟前廣場演出酬神。看歌仔戲為台灣農業社會的主要消遣娛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時多方禁止，但在民間仍維持其勢力。

出發，我們就這樣搭上船回到八重山。

雖然是戰前居住過的場所，但戰後的八重山已經成為「外國」，出發前往時除了搭乘走私船偷渡的過程相當危險，抵達八重山之後是否能夠安然生活，也令他們感到強烈的不安。在這樣的心情之下，他們只能將自己的命運托付在廟裡求到籤——也就是神明的意旨之上。對於不識字的他們來說，籤詩的解讀只能仰賴廟裡面幫忙解籤的人。即使是經由多重媒介收到的訊息，因為正好對應他們所處的狀況(出發遠行、東邊的方向)，使得他們對於神明的指示更加深信不疑。然而，回到石垣島不久之後，這位女性的先生(78歲)卻又因為參與走私活動，而再度往返於危險的海域：

當時，在石垣島才2、30日圓的輪胎，拿到台灣轉手可以賣幾百日圓，所以我就去做ヤミ(走私)。過沒多久，船隻在海上遇難，船長說錢跟命只能選一個，於是我們將貨品全部丟到海裡，好不容易才在基隆上岸。上岸後在基隆的旅館昏睡了三天，沒有換洗衣物，只能穿著溼透的衣服睡。三天後醒來，全身被跳蚤咬得通紅。經過這次後，再也不敢做ヤミ了。

對於國家而言，走私與偷渡的行為意味著國界受到侵犯；然而，對於生活在國界地帶的人們來說，卻是求生存、獲取暴利的手段。走私船的船長對於海岸巡視的時間表都很清楚，所以能逃過無形的國界管制。然而，海上的狀況卻是完全無法掌握的。經由走私船偷渡回到八重山的這位男性，才知道當時偷渡成功其實是「神明的保佑」。

第一代台灣人移民表示，歸化日本籍「主要是為了小孩的教育與就業著想，至於我們自己，反正就是住在這裡，歸不歸化其實沒有差別」。其中也有年紀較大的第一代移民堅持「要做台灣人」，不願意跟著兒

女、孫子一同歸化，還常開玩笑地說「你們那邊一國，我自己一國」。不過，即使已經歸化為日本籍，並在石垣島擁有房屋與土地，第一代台灣人移民都還是自認為是台灣人。因為第二代、第三代大多已經不會說台語，所以他們跟兒孫、石垣島當地居民均以日語交談。然而，第一代移民彼此之間，不管在公私領域都是以台語交談。戰後成為台灣人聚集場所的公共市場巷弄內，一直到現在，還有數家台灣人經營的雜貨店、餐廳，常可見到台灣人第一代聚集在一起用台語閒聊。

除了每年回台灣探親，第一代台灣人移民幾乎每天都聽台灣的廣播節目。以前的廣播節目幾乎都是北京話，90年代後半以來台語的節目增多了，聽不懂北京話的他們也增加許多選項。在石垣島可以清楚聽到宜蘭、花蓮、台東等台灣東部的電台，除了台語歌曲、談話節目、新聞台之外，直銷具有中藥成份的藥品的賣藥節目也相當受歡迎。他們相當熱心地收聽節目，然後透過台灣的親戚朋友代為購買需要的藥品。當台灣人聚集時，便會交換從收音機當中聽到的藥品以及台灣的新聞等最新情報。繼承父親田地，留在名藏、嵩田山上耕種的第二代台灣人家中，只要裝設收訊器，還可以觀看台灣的電視節目。第一代台灣移民主要來自於台灣西部的彰化、員林，台灣中央山脈的阻隔使得他們無法聽到故鄉的廣播台。然而，中央山脈以東的台灣東部，以及石垣島沿海的市街之間，汪洋大海為唯一的阻隔，無形的電訊不費吹灰之力便能跨越，使台灣人移民能夠「同步」體驗台灣的時空。

此外，幾乎所有的台灣人家中，都有台灣式的神明桌，祭祀觀音等台灣的神明以及家族祖先。第一代移民在70、80年代經濟狀況良好之後，紛紛利用回台灣的時機購買神明桌，托店家運送到基隆港然後以船運送到石垣島，擺放雙親家人的「公媽牌」(牌位)。同時，將名藏、嵩田山上葬於簡單墳墓的家人骨灰，移到石垣島市街邊陲地帶的台灣人共

同墓地。大多數人特別從台灣運送石材、僱用石匠與風水師，建造台灣式的墳墓。即使是建造沖繩式的墳墓者，墓碑的內容也都是仿照台灣的形式，載明中國的祖籍地。墓碑上墨書的中國祖籍地古地名、台灣出身地名、以及日本姓氏旁的台灣舊姓，可說是台灣人移民跨越八重山、台灣與中國之間多重的國界與海域¹³⁾，紀錄其出身源頭的儀式性行為。其中，也有人將在台灣過世的雙親家人的遺骨移到石垣島葬在一起。有位78歲的老先生即特別建造台灣式墳墓，與留在台灣的兄弟們協商，將雙親在台灣的遺骨移至石垣島。他的理由是，「如果不這樣做的話，等到我死了之後，子孫就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了」。雖然他與雙親相處的時間很短，然而，將雙親的遺骨移到自己度過大半輩子的八重山，不外乎是確認自身的台灣人出身，同時將自己的台灣人源頭傳承給世代代的子孫。

從1939年開始，台灣人還將「拜土地公」¹⁴⁾的民間祭祀活動帶到八重山，除了戰爭期間中斷數年之外，一直延續到現在。因為要宰殺整隻豬奉獻給神明，被當地人稱為「豬的祭典(豚祭り)」，成為石垣島著名的民俗活動之一。原本都還在豬隻身上插一把屠刀，後來因為來參觀土地公祭典的名護國小學生覺得很可怕，在第二代台灣人的建議下於2001年開始便不再插刀。關於八重山的「拜土地公」儀式之由來以及最初祭祀型態有各種說法，某位曾經實際參與戰前祭祀活動的台灣人男性提供的版本如下：

13) 1980年代到東南亞觀光的第一代台灣移民，聽到中國閩南出身的當地華僑講「我們台灣人的台語」相當地驚訝。

14) 俗稱土地公的福德正神為中國自古以來祭拜的農業神，漢人移墾台灣初期，面臨嚴酷的自然環境，在台灣各地建造土地公廟來祈求豐收，普遍程度可用「田頭田尾土地公」來形容。姜義鎮，《台灣的鄉土神明》。台北：臺原出版社，1995年，165-167頁。

接連數年為颱風所苦的台灣人，向土地公祈求風調雨順，承諾如果今年採收期沒有颱風災害，將宰殺豬公祭拜表示謝意。結果當年如願以償得以豐收，台灣人便聚集起來舉行拜土地公的儀式。從牲禮到祭拜的方式都以台灣式進行，甚至還有業餘的台灣人粉墨登場，以台語演出「大戲」獻給神明。

八重山的拜土地公向來都是台灣人自己的祭祀活動。雖然從戰前到現在一直都「借用」名藏在地聖域的「御嶽」舉行，沒有自己另闢土地或建築，即使是在台灣人紛紛移居石垣島市街之後，還是都維持在名藏「御嶽」舉行。當年自用車不普遍時，第一代台灣移民在祭典當日大清早，便以扁擔扛著牲禮供品前往山上祭拜。而且，即使戰後宮古島移民開始在同一個「御嶽」舉行豐年祭之後，台灣人的土地公祭祀並沒有與在地祭典活動合併，戰前的移民傳承給戰後的新移民，一貫由台灣人主辦與進行。土地公祭祀從中國移植到台灣，再從台灣移植到八重山，在移居地均生產出奠基於隨之移植的地緣及血緣人脈之祭祀圈。

從戰前到戰後，台灣與八重山島嶼之間的海洋，在中國、日本之間的現實政治角力之下，從可以自由來往的國內航線，成為美英戰鬥機攻擊疏散船的戰場，繼而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國與美軍統治下的琉球政府之間的國界。在東亞地區政治翻弄下往返於海洋兩側的第一代台灣人移民，親身體驗到包含國界、地緣、血緣、民族、語言、戰爭、國籍等各種不斷變動的「界線」。然而，藉由祖先祭祀、墳墓、拜土地公與傳統年節等台灣傳統文化實踐，台灣人移民在經歷種種界線變動的同時，仍然不斷回溯、傳承自己民族與生命的源頭——台灣。

II. 大阪豬飼野的濟州島移民

與八重山的台灣移民一樣，戰前就已移居大阪的濟州島移民同樣也經歷了各種「界線」的變動，在不斷「跨界」的生命歷程中，呈現與「故鄉」之間的斷絕性與連續性。作為戰前的第一代移民，他們同樣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歸化日本籍，卻仍然保有原鄉的民族認同與情感聯繫，在移居地形成緊密的血緣與地緣關係網絡。然而，基於台灣島與濟州島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學位置差異，以及台灣與韓國從戰前到戰後初期各自的歷史發展脈絡，他們的移動經驗與認同轉變仍然有相當顯著的差異。以下即針對大阪豬飼野¹⁵⁾濟州島移民的歷史經驗，與八重山台灣移民進行對話，以更廣角的視野來反思東亞地區國界思考的局限性。

在日朝鮮人勞動者報導作家的金贊汀於1970年代實際採訪豬飼野的朝鮮人耆老，並輔以官方行政紀錄、《民衆日報》等朝鮮語報紙的報導，回溯戰前豬飼野地區朝鮮人聚落形成的過程、民衆的生活與勞動狀況。一般認為朝鮮人在豬飼野的集團居住，是肇始於1923年開工的平野運河開鑿工程的朝鮮人土木工人在該地區的大量定居。然而，金贊汀根據當時的地圖以及豬飼野耆老的回憶，指出此說應為誤傳，¹⁶⁾進而

15) 位於大阪生野區。古稱豬甘野，五世紀時百濟渡來人開拓百濟鄉的場所。1973年2月1日，分別被劃分到鄰近的鶴橋、桃谷、中川西、中川、田島等區域，從地圖上消失。然而，在日朝鮮人慣以舊名稱呼。趙博、「豬飼野今昔」、「曹智鉉寫真集 豬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新幹社、2003年、139頁。

16) 首先，他認為平野川的運河工程開始於1921年、完工於1923年。其次，豬飼野的朝鮮人集團與平野運河開鑿工程的朝鮮人土木工人沒有直接關聯。這是因為，參與運河工程的朝鮮人土木工人均在工程現場的「飯場」生活起居，工程結束後便跟著移動到下一個工程現場，沒有在當地定居的必要性。更何況，當時豬飼野週邊為一片荒野，沒有可資租賃的人家。針對以上兩個說法，杉原達則指出開鑿工程完成之後堤防工程仍然繼續，另外，豬飼野的朝鮮人集團與平野運河開鑿工程的朝鮮人土木工人沒有直接關聯，但從地域史的角度來看仍有重大意義(176

根據大阪市社會部等官方的報告書，推測朝鮮人是於1920年左右開始在豬飼野地區的「朝鮮町」定居，1922年左右開始在豬飼野定居。1922年大阪整體的朝鮮人移居者急速增加，是因為濟州島與大阪之間由尼崎汽船開設定期航線「君之代丸(君が代丸)」，旅程較以往經由釜山、下關縮減二分之一，船資等旅費減少為三分之一所致。¹⁷⁾除了朝鮮整體的農業經濟崩解之外，濟州島本身的漁業也受到日本現代漁業的打擊而凋零，棉花栽培與手工紡織家庭工業也因日本大規模紡織工業的廉價棉織品之輸入而崩解。尼崎航路開通後兩年的1924年，朝鮮郵船的定期航路也開通，該年大阪的朝鮮人當中濟州島人的比例已經達到60%。除了濟州島人獨特的風俗與相互扶持的習慣，集中於豬飼野地區的零細工廠較之於土木、礦工等更適合有家庭內工業經驗的他們，加上日本各地的濟州島人受到「陸地」(朝鮮半島)出身者的歧視，使得豬飼野的濟州島人聚落逐漸形成。根據1934年的統計，有25%的濟州島人到日本內地工作，他們即使在日本過著貧困的生活，大部分的人還是省吃儉用寄錢回濟州島維持家計。¹⁸⁾日本學與文化交流史學者杉原達1998年出版的大阪朝鮮人史研究，也以豬飼野與濟州島為討論的中心，利用大量的歷史統計資料與耆老訪談，詳細考察在阪朝鮮人的渡航過程、大阪濟州島航路的開設與競爭、橡膠工廠的發展與朝鮮人的定居、當時的同化論述等，細緻地勾勒濟州島人的移居歷史過程與型態。¹⁹⁾

戰爭結束之後，大多數在日朝鮮人都表達想回到祖國的希望，然而由

177頁)。

17) 金贊汀、「異邦人は君が代丸に乗って—朝鮮人街猪飼野の形成史—」、岩波新書、1985年、19-53頁。

18) 同註18、頁93-103。

19) 杉原達、「越境する民—近代大阪の朝鮮人史研究—」、新幹社、1998年。

於緊接著的政局混亂以及韓戰爆發，大部分的人都暫時卻步。1948年濟州島四三事件爆發之後，偷渡到日本避難的濟州島人據說約有2萬人，其中來到豬飼野投奔家人親戚的應該超過1萬人，偷渡時被捉到的人則被強制送返。²⁰⁾北朝鮮建國之後，在日朝鮮人也隨之分裂為南北兩派，分別受到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總聯)與在日大韓民國居留民團(民團)兩組織的影響。朝鮮戰爭期間，豬飼野地區的小型機械工廠、金屬工廠投入炸彈引爆線保險栓與螺絲的製造，引發同族間的衝突。²¹⁾1959年基於北朝鮮與日本紅十字會之間的「在日朝鮮人歸還協定」，朝總聯主導的「朝鮮歸還實現運動」開始實施，直到1967年10月20日出發的第154次歸國船為止，總共有88611人的在日朝鮮人歸還祖國(北朝鮮)。

1933年的《朝日畫報》當中，曾刊載豬飼野御幸森的朝鮮市場之報導，〈白衣與豬頭描繪的大阪新景點「朝鮮市場」—大阪・豬飼野—〉的題目，對應著照片中購物的女性們身上的白衣，以及肉攤上的豬頭。文章的內容主要報導朝鮮市場販賣的牛內臟、豬頭、鯊魚等「怪異(グロ、grotesque)」食物，以及市場在兩年前從朝鮮人零散的攤子，到每日近一萬人聚集購物的大規模之過程。²²⁾從文章中「鮮人」、「怪異」的歧視性用語，可以感覺到當時以日本民族為本位，將殖民地民衆與文化視為「他者」的時代氛圍。即使是透過日本人的角度，30年代初期朝鮮市場的民族活力，仍然鮮活地從照片與字裡行間滿溢而出。

20) 曹智鉉、「はくと濟州島と猪飼野、そして部落—あとがきにかえて—」、『曹智鉉寫真集 猪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新幹社、177頁、2003年。

21) 金時鐘、鶴見俊輔、「〈對談〉戰後文學と在日文學」、金時鐘「金時鐘詩集選 境界の詩 猪飼野詩集/光州詩片」藤原書店、2005年、322-325頁。

22) 趙博、「猪飼野今昔」、『曹智鉉寫真集 猪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新幹社、144-145頁、2003年。

在婚喪喜慶方面，從戰前至今，豬飼野的朝鮮人盡量以朝鮮傳統的方式來進行。以喪葬為例，早在1920年代，豬飼野的濟州島人爲了固守故鄉土葬的習俗，而將死者遺體以船隻送回故鄉安葬。在移居者人數還沒那麼多時，甚至是由租屋處的同胞集資幫忙。直到昭和10年(1935年)代都還有濟州島人將死者遺體送回故鄉土葬。後來即使採取日本式的火葬與葬禮，也都會將骨灰送回故鄉，再次舉行正式的葬禮。²³⁾出身於元山市、在濟州島長大、捲入四三事件而逃亡日本的在日朝鮮人詩人金時鐘，因而將往日的豬飼野火葬場，形容爲充滿無法歸鄉的朝鮮人「怨念」的場所。²⁴⁾一直到戰後，豬飼野地區的朝鮮人幾乎都沒有建造墳墓，而是將牌位與黑白遺照暫時供奉於神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歸故土。²⁵⁾

一直到現在，豬飼野各個家庭仍然舉行傳統祭祀活動，使得朝鮮市場的水果攤生意興隆，尤其是每年四月份爲了紀念四三事件，祭祀活動特別集中。²⁶⁾ 第二代濟州島移民的女性詩人宗秋月，從女性的角度側寫1960年她16歲以來定居的豬飼野社會，描寫包含她婆婆在內的濟州島女性將手工業賺來的儲蓄幾乎全數貢獻給神房，祈求家人病痛痊癒與家庭手工業訂單不斷：

不管從巷弄的任何地方都能聽到敲打太鼓與鉦的聲音，被稱爲神房的巫女依照該戶人家女性強烈的願望進行消除災厄的誦經、勸說帶來災厄的無法成佛孤魂之咒文、巫女成爲靈媒向家人訴說無法成佛的理由之場景、或是巫女托宣未來的聲音，這些與家庭加工業與家庭手工業的喧噪

23) 同註18, 頁113-117。註20, 頁130-132。

24) 金時鐘、「映像がかかえる言葉」、『曹智鉉寫真集 豬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新幹社、2003年、頁53。

25) 宗秋月、「豬飼野タリョン」、思想の科學社、1986年、211頁。

26) 同註23、頁140。

聲音成爲互相調和的自然之聲。由此看來，我們熟知的表現方式或許都是不適當的。²⁷⁾

相較於戰前的工廠勞動，豬飼野街頭巷尾的家庭加工業與手工業雖然仍是收入微薄的勞動密集工作，但是至少家族可以在一起。侵入家庭日常生活領域的機器的「喧噪聲音」，與巫女除厄、超渡、顯靈與托宣的聲音之所以「互相調和」，是因爲它們都以「聲音」的形式，訴說著豬飼野濟州島人在歷史翻弄下無法言喻的苦痛，以及他們試圖緩和人生苦痛的最大努力。濟州島人從戰前到戰後的離散歷史與悲喜，已經超乎「我們熟知的表現方式」所能適當呈現的。

同爲第二代濟州島移民²⁸⁾的在日朝鮮人作家金石範，自1957年的〈鴨之死〉等短篇小說以來，以濟州島四三事件爲其生涯創作主題，並於1997年出版耗費20年心力的巨著《火山島》。²⁹⁾ 四三事件發生後，他受到遠親叔父之託，到對馬迎接偷渡的叔母與另一名女性，從兩人處間接聽聞的四三事件慘況帶來極大的衝擊。在談到這段經歷後，他繼而描述濟州島作爲自己認知上的「故鄉」所具有的獨特意義：

即使是在那之前，對我而言濟州島與其說就只是單純的故鄉，不如說是象徵朝鮮自身的一種具有理念性格的存在。在日本長大的我，少年期首次接觸到濟州島大自然令人懾服的壯麗，陽光燦爛的耀眼豐饒的大海，雄大絕美的漢拏山之姿態帶來的壓倒性力量，很快地像是某種放射線般地開始破壞我內部的東西。之後，隨著數次往返於濟州島的經驗，

27) 同註26，頁202。

28) 1925年，他的母親從濟州島來到豬飼野後三、四個月出生。

29) 1976年至1983年完成第一部，1987年至1995年完成第二部，全七卷共四百四十萬字。

那個破壞力開始確實地發揮實際效能。我內部的「日本人」開始受到摧毀，「日本人」是受到外部強制這樣的認識，使我產生民族的覺醒。也就是說，我成爲自己稱之的「小小民族主義者」。

就這樣，濟州島開始在我心中作爲「故鄉」而存在。那不是從一開始就被賦予的「故鄉」，而是被我認知爲「故鄉」的。濟州島是我的朝鮮之精要、濃縮後的型態與核心。對我而言，沒有濟州島的朝鮮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對於無法在濟州島出生、在那裡長大的痛恨心情，成爲我作爲亡國之民、流浪之民的子嗣，夢想著喪失的祖國之獨立的強大動力。³⁰⁾

即使是在四三事件的歷史悲劇發生之前，少年期歸鄉經驗中接觸到的島嶼大自然，帶著無可抵擋的力量，讓在日本出生長大的他「產生民族的覺醒」。異民族殖民統治的苦痛歷史，剝奪了他的濟州島故鄉，使他成爲「亡國之民、流浪之民的子嗣」。因此，金石範將自身生涯的寫作實踐，定位爲「透過想像力奪回被奪走的故鄉、被奪走的祖國。那也是奪回被奪走的人們，包含自己在內的人們的解放」。³¹⁾日本殖民統治、二次大戰開始與結束、四三事件，朝鮮戰爭等國家與民族滅亡、離散、分裂的歷史經驗，與金石範的「故鄉喪失」經驗彼此密不可分，他耗費生涯完成的《火山島》雖然是虛構的產物，卻強而有力地「透過想像力」介入東亞冷戰時期國族主義的大歷史，將濟州島的獨特歷史事件普遍化爲人類共通的課題與思考。

同時，金石範對於戰後東亞「國家」的思考，也呈現他從戰前到戰後的跨界移動歷史與經驗，生產出何種另類的國家想像。首先，他至今仍拒

30) 金石範、「濟州島と私 Iなぜ「濟州島」を書くか」、「新編「在日」の思想」、講談社文芸文庫、2001年、219-220頁。(初出は「月刊エコノミスト」1974年12月号)

31) 金石範、「濟州島と私 III濟州島と私」、「新編「在日」の思想」、講談社文芸文庫、2001年、234頁。(初出は「耽羅研究通信」第二号、1985年7月)

絕取得韓國籍，寧願作為一個早已不存在的「朝鮮籍」(形同「無國籍」)者，不願意選擇「南」「北」民族分斷的國籍，並在韓國提案針對在日朝鮮人制定準國家的統一國籍，使得在日朝鮮人能夠自由往來南北韓，成為未來統一的橋樑。³²⁾他並將侵略性的國族主義(以沾染他國無辜國民血液的國旗為象徵)與新興獨立國的民族解放進行區別，認為後者是「近似於從無到有的創造，必須在現實而非觀念的層次打造自己的國家」，進而邁向真正的國際主義。³³⁾歷經東亞國族主義劃分出來的種種界線帶來的苦痛與怨恨之後，金石範以濟州島為原鄉與起點，創造出與民族、土地密切結合的「國家」理念——一個尚未實現但值得畢生執著與追求的梦想。

Ⅲ. 超越東亞國族主義的跨界思考

與大阪豬飼野的濟州移民相較，八重山的台灣移民在人數、規模上當然是遠遠不如。然而，同為往返於東亞國族邊境的歷史主體，他們的跨界經驗均呈現東亞國族主義與近現代史無法收編的流動性樣貌。促成台灣人與濟州島人移居的主要歷史因素，均為日本殖民統治下農村的崩解以及直航航運的開通。日本的殖民統治促成日本與台灣、日本與朝鮮之間的國界消失，使得無法生存的殖民地農民能到日本尋找出路；尤其是直航日本的航線開通後，跨越海洋更成為島嶼出身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身為被殖民者民族，台灣移民與濟州島移民在日本遭遇種種的

32) 金石範、「韓國民主化は實ったか」、「新編 「在日」の思想」、講談社文芸文庫、2001年、274-275頁。(初出は『毎日新聞』1998年9月9日夕刊)

33) 金石範、「私にとって國家とは」、「ことばの呪縛—「在日朝鮮人文學」と日本語—」、1972年、筑摩書房、265-266頁。

歧視與阻礙，然而，1920、30年代作為日本化外之地的八重山，以及「東方曼徹斯特」的大阪，造成台灣移民與濟州島移民不同的命運。³⁴八重山的台灣移民在瘡疾肆虐的山上從事農業開墾，徒步一個半小時到石垣島市街販賣農作物，並購買鹽、醬油等日常用品。雖然生活很辛苦，但在台灣人經營的「大同拓殖株式會社」之下，至少有耕種的田地與簡陋的家屋，有台灣人單獨的聚落，不像濟州島移民必須在日本人當中承受沒有房子居住、工廠的勞動剝削與民族歧視。也就是說，往日本鄉下或都市的移動目的地差異，農業移民與工業移民的工作性質差異，造成兩者在異鄉的不同生活體驗與處境。

從戰爭期間到日本投降、戰爭結束為止，台灣移民與濟州島移民都在政治國界的不斷變動下，被迫接受生離死別的家族離散命運。回台灣避難的台灣移民到了戰後，隨即失去日本人的身分，必須以偷渡的方式才能回到八重山的家園。跨越國界的走私、偷渡為國界之島的居民帶來暴利，但也同時意味著生命的危險。八重山台灣移民戰後的國籍身分，先後受到沖繩由美軍統治歸還日本，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治角力所影響，然而，第一代移民即使在歸化日本籍之後，還是繼續保有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同樣地，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迫離鄉背井的大阪豬飼野濟州島移民，即使在日本投降之後，因朝鮮半島的動亂依舊無法安心回到祖國，故鄉甚至在四三事件過程中飽受摧殘，祖國也隨之分裂為南北直到現在。即使是60年代「朝鮮歸還實現運動」中出於自己意志前往「地上的樂園」北朝鮮的人，仍然無法找到他們得以安居樂業的歸屬之地。

34) 西表島的台灣人礦工歷經低薪資、重勞動、高危險勞動環境，較為接近於在日朝鮮人勞動者的經驗。由於當時的經歷太過嚴酷，後來移居石垣島從事農業的受訪者，大部分不願意多談在西表島的往事。

杉原達提案透過大阪的朝鮮人史來思考「越界的日本近代史」、「從地域來看世界史」，他表示「如果受到歷史佐證的思想能夠屈抵人們生存方式的深處，反響主體的確立的話，那應該是要以某種方式，不斷思考超越生活場域的型態與方式」。³⁵⁾本文將八重山台灣移民與豬飼野濟州島移民關於各種「越界」的敘事，放置在兩者的移動歷史經驗脈絡下，呈現出國家與民族交界處的島嶼居民之「越界」經驗與思想，具有生產新的認同與歸屬想像之潛在能力。

從東亞國家政治版圖與角力關係來看，台灣、八重山、濟州島、大阪之間的兩個流動與移居的歷史，都是發生於國家或帝國「大歷史」的邊陲。然而，他們與國家中心的相對性邊陲，同時也意味著他們與國族界線的鄰近，促使他們能夠在不同質的僵硬政治區塊之夾縫當中，掙扎著穿鑿個人的生路。他們的跨界流動經驗，超越了現代國族思想中民族、國家、語言、文化之間單一的對應關係，生產出有異於現實政治意識形態與運作邏輯的概念與思考。「越界者」看起來似乎不受「界線」的束縛，但其實沒有人比他們更意識到「界線」的存在以及影響。在不將他／她們的人生經歷浪漫化的狀況下，我們應該透過國界之島的人們之移動軌跡，以及從中產生的「界線」感覺，試圖使近現代國族主義下僵化的「國家」與「文化」的界線，能夠因應人們實際上的生活經驗與存在狀態，創造出更具流動性與柔軟性的概念與思考。

35) 同註20，頁213。

참고문헌

1) 中文書目

- 朱惠足, 〈做爲交界場域的「現代性」: 往返於沖繩八重山諸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 《文化研究》5, 2007年。
姜義鎮, 《台灣的鄉土神明》。台北: 臺原出版社, 1995年。

2) 日文書目

- 三木健, 『西表炭坑夫物語』, ひるぎ社, 1990年。
石原昌家, 『空白の沖繩社會史—戰果と密貿易の時代』, 晚聲社, 2000年。
杉原達, 『越境する民—近代大阪の朝鮮人史研究』, 新幹社, 1998年。
林發, 『沖繩バイン産業史』, 自費出版, 1984年。
金石範, 『新編「在日」の思想』, 講談社文芸文庫, 2001年。
金石範, 『ことばの呪縛—「在日朝鮮人文學」と日本語—』, 筑摩書房, 1972年。
金贊汀, 『異邦人は君々代丸に乗って—朝鮮人街猪飼野の形成史—』, 岩波新書, 1985年。
金時鐘, 『映像がかかえる言葉』, 『曹智鉉寫真集 猪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 新幹社, 2003年。
金時鐘, 鶴見俊輔, 『<對談>戰後文學と在日文學』, 金時鐘 『金時鐘詩集選 境界の詩 猪飼野詩集/光州詩片』, 藤原書店, 2005年。
宗秋月, 『猪飼野タリョン』, 思想の科學社, 1986年。
松田良孝, 『八重山の台湾人』, 南山舎, 2004年。
曹智鉉, 『ぼくと濟州島と猪飼野, そして部落—あとがきにかえて—』, 『曹智鉉寫真集 猪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 新幹社, 2003年。
趙博, 『猪飼野今昔』, 『曹智鉉寫真集 猪飼野 追憶の1960年代』, 新幹社, 2003年。
嵩田公民館記念誌編集委員會, 『嵩田—50年のあゆみ—』, 1996年。

Abstract

Border Crossing, History, and Iden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ese in Yaeyama and Jeju People in Osaka

Hueichu Chu*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tion experiences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ese in Yaeyama and Jeju People in Osaka, exploring how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f border crossing of island people in the border area of nations intervene the nationalism rooted in the territorial ideas that dominate Mainland China,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ese Archipelago.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litical territorie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se two histories of migration happened in the peripheries of nations or empires. However, the relatively peripheral location also means their being adjacent to the borders, making possible their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the interstice of political regimes. Their experiences of migration transcend the existing confinement of single n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ducing ideas and thoughts deviating from realpolitik and logic. Those who crossing the border may seem free from the restricts of borders, but in effect nobody can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existence and impact of border. Without romanticizing thei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we should make effort to create more flexible and soft ideas and thoughts on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rders that can correspond to real life experiences and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existence conditions through the movement traces of borderland people.

Key Words

Taiwanese in Yaeyama, Jeju People in Osaka, immigrant, border crossing

교신 : 朱惠足 臺灣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E-mail : hueichu@gmail.com 전화 : +886-4-22840671)

논문투고일 2010. 12. 14.

심사완료일 2011. 01. 12.

게재확정일 2011. 02. 10.

